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二九二）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 • — •

—— 增刊 第四五八期 ——  
（二〇〇五年十月四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0510b）

---

【童年旧事】九岁的反革命	齐鲁狂生
【恐怖记忆】八岁的死刑陪绑者	冯骥才
【往事如烟】那富有命运特征的一天——文革38年祭	陈家琪
【口述历史】那一夜惊心动魄——913事件追忆	康庭梓
【难忘岁月】《风雨人生路》摘载（之十二）	刘文忠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mailto: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

【童年旧事】

九岁的反革命

• 齐鲁狂生 •

八岁那年，我上小学了，虽然是个混乱的年代，但老师多少也教几个字，记得语文课文内容都是些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的政治口号。但是老师教得很认真，并且反复警告我们这几个字绝对不能写错、更不能乱写。说这话的时候老师的脸色就像父亲母亲一样的铁青。我就知道这是一件可怕的事，搞不好又要吃包着耗子药的饺子，又要死掉。我吓得大哭起来，裤子也尿了。老师不知所措，只好把我送回家。

回家以后，我坚决拒绝再去上学。农村的孩子上学晚，我在班上算是年龄最小的学生，父母无奈，就决定让我第二年再读。

第二年我刚上学，我们学校就出了一件政治大案。比我的高一年级一个叫翠儿的9岁女孩被当成反革命抓起来了！

当时的胶东国贫民穷，学校的办公费主要依靠学生勤工俭学，高年级的学生养猪种地，我

们低年级的学生养兔子。为了给兔子提供食物，我们常常要在寒冷的冬天到野外去挖野菜。学生们连棉鞋都穿不上，更不用说戴手套了。一些聪明的学生就挖鼠洞逮老鼠，将老鼠皮剥下来做手套，鼠肉则烧着吃。那时人太穷，田里没有粮食可偷，连老鼠也又瘦又小，常常几个老鼠皮做不成一副手套。

有一次，翠儿和小伙伴们捉到了一只又肥又大的老鼠，剥下皮来竟然可以做一只完整的手套，翠儿高兴极了，脱口说：“天大地大不如老鼠皮大。”

当时有一首流行的革命歌曲，其中有两句歌词：“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翠儿一言既出，其他学生也跟着唱起篡改了的歌词：“天大地大不如老鼠皮大，爹亲娘亲不如老鼠皮亲……”因为新奇、有趣，被篡改的歌词一时流行校内外。

这两句歌词传唱到我们班时，只有我一个人没有唱。后来老师追查的时候，全班 54 名同学齐刷刷地站起了 53 名，只有我一个人稳稳地坐着。其实，并不是只有 9 岁的我有多高的政治觉悟，而是那个深夜笼罩在心头的恐惧让我像小狗一样敏锐地嗅到了那两句篡改了的歌词的危险气味！

翠儿最终被作为篡改歌词的原创作者当上了最小的反革命分子，每当开批斗会，她都会跟着地主、富农、坏分子以及像我爷爷那样的“历史反革命”一起被押上台去接受群众批判。不同的是那些成年被批斗的对象都是五花大绑，在台下排山倒海的口号声中由两个年轻力壮的大汉两边夹着押上台去，翠儿则由一个大汉揪着头发脚不沾地提上台去。久而久之，翠儿的头发被揪光了，造反派们就提着她的衣领，有一次，我在露天的主席台下，亲眼看见她被衣襟勒得当场翻白眼昏死过去。

1972 年冬，大规模的批斗会不太开了，不少斗争对象都回了家。因为翠儿是现行反革命，她的父母和学校都不肯收留，翠儿流落街头。有一次，好像是年末，学校已经放了寒假，我护校时，在学校影壁后面见过她避雪，衣衫褴褛，像三毛一样飘零的几根头发，还有一双惊恐的小老鼠一样的眼睛。

第二年，我们村里的人都没再见过她，她家里的人也没有找过她，这个小女孩从此无影无踪。她大约已经死在了那个让人恐惧的年代了吧。

~~~~~

【恐怖记忆】

八岁的死刑陪绑者

• 冯骥才 •

1968 年 8 岁 女 Y 省 G 市学龄前儿童

你要求亲身经历文革的人自己口述，我想转述一个故事给你。这是当事人亲口讲给我的。我一直打算把它写成小说，可是读了你的《一百个人的十年》一些篇章后，觉得这故事放在你的书中更合适，我想你很难找到这样一个深刻的典型，更能揭示文革的残酷性。

这故事的主人是一个八岁的死刑陪绑者。怎么，你不信？对，八岁，不是十八岁。她面对一口枪时，并无绝望心理，相反认为好玩。你别急，我说这故事马上讲给你，而且完全如实地

讲，不加一点虚构的渲染。我知道你要求一种事件本身的彻底真实。

那是1979年，云南边境的战火未熄，我去前线采访。由北京飞到昆明后，忽然感到胸闷，喘不过气。有人说这是高原反应，往南走地势低就会好些，我便一天也没在昆明停留，拉上两个从北京来的画家搭伴，乘车经K市到达G市。据说由G市再往南必须翻山越岭，必须搭军车。天色已晚，不容易找到车搭，便在G市过夜。G市已经很有些前线气氛了。街上有许多军人；不少装满军用物资的大卡车，蒙着大网，插满松枝做防空伪装，停在道边；人们谈话也大多是战争内容。我们跑了几家旅店都因客满而碰壁。经市委安排，我们住进市委的第一招待所。

在招待所食堂吃晚饭时，服务员是个看上去十七八岁的少女。她好勤快，可给我们上菜时一看我就笑。她长得漂亮，一笑更漂亮。但这不是城市常见的那种艳丽的、时髦的漂亮，而是像云南山水，清亮照人，一无修饰。我真很少看到这样一双透亮的眼睛，她撩起眼皮看你一眼，就像在钢琴的高音区敲一下琴键。随便一笑，都是把世界上最美好的感觉送给你。可她不像一般云南姑娘那么矮小，倒像北方乡间的女孩子，红扑扑脸蛋；端起菜碟来，那胳膊是方的，手腕很粗，指头都是圆圆的。她的漂亮是溶在一种淳厚的气质里。我问她：“你为什么总笑我？”她说：“你个子太高嘛！”又一笑。她说得直了了。也许我见到城里的姑娘都太会说话，会装腔作势和绕弯弯儿，一遇到这种纯朴的女孩子，就像出城到乡野看到树林、草原、飞鸟、自在流淌的河水那样，一片自然，令人欢愉。我同行那两位画家比我对美更敏感；画家的天性是抓住美不放。他俩向她提出，晚上她下班后，请她到我们房间，为她画像。她表情似乎有些为难，可是当两位画家告诉她，我是个作家时，她专意看我一眼，这回没笑，竟毫不犹豫地点头答应了。

晚上，她来了。刚刚下班，白布围裙还没解下，进屋时使围裙擦着刚洗过而湿淋淋的一双白手，这滚圆的小手给凉水刺激得通红。两位画家请她坐下，支起画板，这时她略略有些拘束。一位画家说：

“老马，你跟她聊聊天，她就会放松了。”

我笑着对她说：“你不怕作家吗？”

不料她挺郑重其事地说：“我正在找一位作家，写写我。”

我大笑起来，说：“你一个小姑娘有什么好写？写你哭鼻子吗？”

更不料，她那明亮的眼睛一下子暗下来，好像乌云的阴影顷刻笼罩水面，居然一种忧虑的、愁惨的、苦涩的情绪灌满了她的眼眶。这决不是一个纯真的少女应有的神情，倒像一个饱经苦难的人才有的目光。她自言自语地说：“你不写，将来我练习，自己写！”

我怔住，难道这姑娘真有什么非凡的经历？我点点头说：“好，你说，我给你写。”就在说这话时，我要命也想不到，她竟然说出了下面一番令人难以置信的经历。她说：“我当了十年反革命，去年才平反！我父亲是市委的中层干部，我家住在市委宿舍大院。文革开始时，我6岁，那时什么也不懂，记的事也都模模糊糊，有的事还记错了。比如我记得一次有一群人闯进我家翻东西，打了我一个大耳光，很疼。后来爸爸说，没人打我，那是打爸爸的。大概我记得的只是一种感觉。打爸爸就像打我，很疼很疼的感觉。爸爸在文革前是组织部干部处的处长，文革开始时挨批，靠边站了。后来造反分两派，爸爸参加了一派，偏偏‘支左’的军队介入，支持另一派，爸爸就倒霉了。可爸爸这派大多是市委的中层干部们，组织性强，文革初大小都被冲击过，更不敢做半点打砸抢那类过火的事情，对立面抓不住把柄，很难把爸爸这派搞垮。但一次两派大联合谈判时，爸爸这派头头没注意，把一本《红旗》杂志坐在屁股下边。对立面有个精明的人上来一下抽出《红旗》杂志，里边有毛主席的照片。那时的杂志几乎全有毛主席像，

这么一下就被对方揪出来。侮辱伟大领袖毛主席，罪大恶极的现行反革命！军宣队立即宣布爸爸这派是反动组织，这派马上垮了。开始揪坏人，凡是过去有点问题的都给打成阶级报复分子、黑帮分子、反革命分子。可他们拿爸爸没法子，爸爸没有短儿。他以前当干部处处长时，总得罪过人，有人恨他，恨不得这下把他整下去。派出不少人内查外调，愈查不出问题火愈大。爸爸本来是不抽烟的，那时却天天抽许多烟。一天抽烟睡着了，把棉褥烧个大窟窿，多亏妈妈一盆水泼上去。真烧起来就会被人家说成放火搞破坏或企图畏罪自杀。压力真是压足了。我妈的心脏不好，整天闹心跳。不知哪天要出什么大祸，可没料到一天出了一件意外的事，目标全集中到我身上。

“这天，我们市委宿舍大院的院墙上，出现了一条反动标语。写着‘打倒毛主席’五个字。公安局来查，根据现场情况确定，是一米二上下的小孩写的。他们根据三条：一是反标的位置离地一米，比成年人蹲着写高，又比成年人站着写矮，正好是小孩站着写高矮正得劲的高度；二是字迹歪歪扭扭，很像小孩的笔迹；三是成年人写这种反标不会写‘打倒毛主席’，应该写成‘打倒毛泽东’。市委大院一米二左右的孩子总共十一人，当时排排队，确定四个重点，都是父母有问题的。只有父母有问题，孩子才可能写这种反标。这时，爸爸对立面那派插手了这件事，说是协助公安系统破获这起重大的反革命案件，内定重点是我。说我爸爸反动，又狡猾，对文化大革命怀恨在心，教唆我写的。当然，他们的目标很明确：是想搞爸爸。当时我八岁……

“他们把我弄去，开始是拿糖哄我承认。从小我爸爸就绝对不准我说瞎话的，也许由于这严格的家庭教育，救了爸爸他自己，我说不是我。他们便送我小人书，画片，还要带我去看电影，我还说不是我。他们就冒火了，那群大人围着我一个小姑娘拍桌子打板凳吓唬我，说我再不承认就去打我爸爸，还说他们要使什么法子打——说用钢笔扎爸爸的眼睛；说用绳子勒住爸爸脖子不叫他吃东西，活活饿死，还说用刀一块块割掉爸爸的肉、手指头、耳朵、鼻子、舌头，一样样带着血扔进公园的笼子里喂老虎。说着真拿起一把刀，装作马上就要去的样子。我吓得哭呀，求呀，怕呀，叫呀，可是还是没说瞎话。我那时才8岁呀，很容易受骗，很容易被吓得上当，为什么始终咬住没胡说，自己也弄不明白。现在想起来真后怕，万一上了他们圈套，一句话，爸爸早给枪毙了……那我也活不到今天，等长大懂事，自己也会悔恨自己而自杀了……

“那段时间，他们为了给我增加压力，把我当作反革命，当作真正的囚犯关起来，不准我和爸爸妈妈见面，倒是很少打我，但常饿我。每天提审一次，随后他们好像没招儿了，就把我弄到市委大院批斗，也挂上牌子，戴高帽，帽子上写着‘现行反革命××’。还在我的名字上打上‘叉’。那天给我的印象很乱；围着许多人喊口号。我一眼在人群里看见妈妈，她睁大眼睛全是泪水，头发很乱，我大叫一声：‘妈——’就昏倒了。后来放出来，妈妈说，那天她并不在场，倒是通知她必须去参加我的批斗会，可是她心脏病突然发作，没去。

“一天，我不想说那一天是几月几日。我家永远记得那日子，我一说，我现在立即就会……就会……好，我就说这天的事吧……

“这天，他们说今天要枪毙我。我不懂什么叫枪毙，问他们，他们说，就像电影里打敌人那样，开枪打死你。我哭了，我说我再见不到爸爸妈妈了吗？他们说，永远也见不到，而且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你全知道了。你要承认是你爸爸叫你写的，就不枪毙你。我说，不是我写的，我想见爸爸妈妈……

“我给他们带到刑场，一片大开洼地，和几个真要枪毙的死囚排在一起，背后是大土坑，那些犯人都给绑着，没捆我，可我吓呆了。对面一排人拿枪对着我们，其中一杆枪对着我的脸，我忽然看见不远一群人中有爸爸！后来才知道他们在逼爸爸，叫他承认是他叫我写的反标。我放声大叫爸爸，要跑过去。这时管执行的人大喊一声：‘放’。‘口平！’地枪响。我旁边那排犯

人突然像柜子一样‘咣当’全栽倒。一个脑袋打飞了，像个大血蛋飞得老远。我吓得原地没动，以为自己死了。眨眨眼，动动嘴，好像全没知觉了。只见爸爸张着大嘴朝我跑来，扑向我，一下把我紧紧抱住。我说：‘我死了吗？’爸爸说：‘没有，孩子，你别怕，他们这是逗你玩呢，这些人都是假死！’我听了，噗地笑了，脑袋扎在爸爸怀里。我真的以为这一切一切，都是哄我玩呢……

“……以后，我被放回家。回到温暖的家就以为那一切全过去了。照旧跑出去找小朋友们玩，可是同院的小朋友都不搭理我，有的还朝我扔石子儿。一次，一个过去跟我要好的小朋友骂我：‘打倒小反革命！’气得我一直追到他家，找他讲理，要他向我道歉。他妈妈出来也骂我：‘干什么，你还想翻案？’从这句话起，我好像一下子大了，也垮了，这‘小反革命’像一块沉重的大石头在我身上背了10年！上小学困难，升中学也困难，红小兵和红卫兵组织都不要我。我就像在那些机关单位被管制的牛鬼蛇神，不敢多言多语，不敢和同学们说笑和玩，碰到不讲理的事也不敢争一句。天天下课，扫地、擦黑板、收拾教室，想这样做来换取同学们的好感，哪怕是一个亲切的眼神儿也好。可8年里我没有一个知心的同学，好像我身上有可怕的传染病菌，人人都避着我。上中学时我换了一个较远的学校，以为别人不知道我过去那事，好受一些。可一次下乡劳动，指导员派我去拉粪车。所有同学都不去，只派了我一个人去。我很奇怪，没等我问，指导员说：‘粪虽臭，但灵魂里的粪更臭，什么时候你不觉得粪臭了，你的灵魂就彻底被改造好了！’我才知道，背上那石头仍旧牢牢存在，一辈子也卸不下来。当夜，我跑出来，撒开腿在野地里跑了两夜。后来爸爸在一条大河边找到了我，我正想死。爸爸为了找我，跑了两夜，鞋子都跑破了。我朝爸爸叫着：‘为什么那次不枪毙我？活着，天天都是在陪绑呀！’……

“从那时我退了学。在家帮妈妈做家务事，除去买菜买东西，很少出门，也不搭理任何人。生活把我开除了，生活还有什么意思？我恨我年轻，前边的日子太长，没有头儿，整天闷闷的，直到粉碎‘四人帮’，爸爸单位清理文革问题时，发现一份有关我的材料，才说给我平反落实。可这时我才十九岁，又没有工作、工资、住房和查抄物资的问题，落实能落实什么呢？政治从来不对人的心灵负责。管落实的那人还不错，很同情我的遭遇，后来他想到一个安慰我的办法，也是他仅仅能做到的事情。他说，你年纪不小，不能总呆在家，应该有个工作，就到市委招待所食堂当个服务员吧。我心想，守在家，妈妈心里总有个负担，就来了。到今天，才来三个月。三个月里，我干的活比谁都多。别人以为我这是出自对落实政策的感激，才拚命干活；其实不然，干起活才能不想事呀，可有时忽然觉得自己像当年在学校打扫教室时那样，总有种负罪心理纠缠着我，摆脱不开，干着活就想到劳改，很不是滋味……这心理你们是很难理解的。我是在童年就低下头的，这头不好扬起来呀……”

姑娘讲到这里，喉咙好像叫什么东西卡住。但两眼里并无泪水，脸上也没有任何激烈的神情，平静得有如阴云密布的天空，隐隐的像要打起响雷，但我明白，她不会再有倾盆大雨、雷电交加的宣泄。年纪轻轻，却早把生活中最难承受的东西都消化过了。我扭头忽然发现，我那同伴两位画家听得睁圆眼睛，张大嘴，无话可讲。画板上的纸，白白的，没有一笔，正如我当时的心境，一片空白，一片可怕的空白。

真正的残暴，是针对无辜。

□ 摘自冯骥才著《一百个人的十年》

~~~~~

【往事如烟】

那富有命运特征的一天——文革38年祭

• 陈家琪 •

(一)

1966年5月16日中午12点，一辆破旧的三轮小汽车拉着我和我的妈妈，连同上面嵌着“汉中留念”的藤制箱子和几个纸盒子，离开了西安市，前往一个两百里外的名叫华县的地方。

我以后才知道那是一种放逐。

也是以后，我才意识到了那是一个富有命运特征的一天，因为就在那一天，中央下发了一个《五一六通知》，于是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了。

所谓命运，不但纯属偶然，而且总免不了事后目的论的联想；如果不把那一天在我个人身上所发生的事与我们这个国家在以后的岁月中所经历的磨难联系在一起，那实在是一个极其平常的一天。

那天好像是一个阴天。当三轮小汽车从解放路拐进东五路时，我记得我最后看了一眼路口那栋在当时已经算得上是很高的大楼，心中充满了豪迈之情，为自己即将步入一个全新的环境而东张西望。一路上，妈妈却始终未说一句话。那时的妈妈才40岁，可在我眼中已是十足的大人，而且似乎从来没有做过一件错事，说过一件错话。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知道不能在西安市住了，妈妈调动了工作，我也转了学；为什么要到华县？因为爸爸在那里。爸爸刚一解放就离开了西安。我原来一直不知道他在哪里，在我的记忆中，他和我一共只见过几次面，而且从不说话。

那时候，身边也发生过一些事，比如上小学时，忽然学校里贴满了大字报，接着，一些老师就消失了，大家窃窃私语一阵，知道了有个可怕的词叫“右派”。但过不了多久，就又载歌载舞，“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爸爸从身边消失得更早，我只知道是和妈妈关系不好，别的就不知道了，也不问，问了也不会有人告诉你，也许是工作需要，总之一家人不在一起是正常的。包括在我们离开西安前所发生的那么多的事，讨论香花与毒草、批判一大批电影、学习有关《海瑞罢官》的文章、揭露“三家村”，等等，似乎也很正常，自己只是一个“旁观”意义上的参与者。

一切都很正常。从来也听不到任何怀疑、不满的议论——也许有议论，只不过绝不能让孩子们听到而已。但我更相信没有议论。一面是镇反、公私合营、大炼钢铁，身边总有些莫名其妙消失了的人，有的是举家迁走，据说是搬到乡下去了；另一面却是出奇的平静。任何异议都没有，不要说异议，就连牢骚也没有。于是感受到压抑，渴望着投身社会。

就这样，在那一天，在那富有命运特征的一天，我离开了西安市，来到了一个名叫华县的地方，这是一个地处关中平原但在贫穷落后上又都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的地方。2003年秋天的渭河大水使它一夜之间成了一片汪洋，后因温家宝总理的视察而名扬天下。

(二)

自那以后，我就在华县呆了12年，直到1978年考上武汉大学的研究生。

这12年可是非比寻常的12年，国事家事混在一起，就如古代希腊的城邦一样，公共的事也就是个人的事，国家的前途也就是自己的幸福。无论再苦、再累、再危险、再冤枉，自己也心甘情愿，一切取决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之所以说它富于“命运特征”，就是因为这一步把我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从招工就业、娶妻生子到远走他乡）都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就是说，没有国家的变化也就没有我个人的变化，招工、招研究生不说了，就是结婚，也取决于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工作表现等诸多因素的变化。

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参加的那个战斗队就叫“5·16”；再后来，开始全国范围内的清剿“5·16”运动，尽管我并不知道那是一个什么组织（就是现在也搞不清楚），但仍然作为一个“无形”的“5·16分子”受到审查。

38年过去了。每年这一天，我总要与人在一起小坐一会（至少是我的妻子），默默的，都不说话，因为无话可说，也无须说话。一切尽在不言中。大家都知道，没有这一天，也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这一天已经不再属于我个人，它属于我们这一代人，具有着事关“一代人思想走向”的“命运特征”。

关于文革，难道我们真的还需要新的资料吗？

不在发现，而在理解；理解就是理解自己的时代，就是理解我们自己。

### （三）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说，自我意识的最初阶段表现为欲望。明清之际，讲“私”、讲“欲”的很多，如“人欲恰好即是天理”（陈确），“人欲之大私即天理之至正”（王夫之）等等。问题在于那时找不到一种使之理性化的渠道，也就是说，形不成一套使欲望堂而皇之释放出来的说法。后来，就有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说。

还是黑格尔的话：这种欲望的释放，先是“确信对方不存在”，也就是打倒对方，杀死对方；再是意识到没有对象也就无法实现自己，“自我意识只有在一个别的自我意识里才能获得它的满足。”于是先是革命、推翻，夺取政权，释放的是集体欲望，构成民族意识；再是限制、共存，在不情愿中相互承认，这时所释放的就是个人的欲望了。

于是也就从计划经济变成了市场经济。

文化大革命也一样，先是你死我活，再是三结合，然后就“相逢一笑泯恩仇”。

无论是集体的欲望还是个人的欲望，都是理性化了的欲望，都有最高调的说法，而且都在意识形态的笼罩下迅速把日常生活的全部领域都理性—欲望化了。

两句典型的经典名言就是把“马克思+秦始皇”改变成“亚当·斯密+秦始皇”。

秦始皇只有一个，马克思和亚当·斯密或别的什么人其实是可以换来换去的。

而在已经有了一个“秦始皇”的背景下想重走“马克思+陈胜、吴广”的人掉了脑袋，想重蹈“亚当·斯密+盛宣怀”之复辙的人尽管下场会好一些，但剩下的也只有仰天长叹。

我们呢？

有人说我们是“披着狼皮的羊”，有人说是“被欺骗的欺骗者”；不管怎么说，在本质性的压抑与强制性的遗忘中，一流的人在名利与金钱中早已肆无忌惮，二流的人在圆滑之余更多了些世故与机心，剩下的，就我辈而言，再不济，也是一些既得利益的维护者。

当然，更多的人下岗了，或仍在某个偏远的角落耕种着土地。

#### （四）

也许哲学真的起于惊讶。文革时最让我惊讶的一件事就是毛主席总是对的，而且一切都不出他的战略部署。

从停课、砸烂桌椅、批斗老师、戴高帽一直到打倒刘少奇，打倒任何一个人，然后又是武斗，杀得尸横遍野；刚刚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还没来得及庆贺，紧接着就是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然后开始了一系列的检举清查运动，自我交代，自我批判，有的判刑，有的杀头，更多的也就从此一蹶不振。问题在于：我们为什么认为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早就设计好的，而且只能这样，只能在这个时候这样，早一点晚一点都不行？最高指示总在最需要的时候说到了我们的心坎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甚至就连林彪事件，也几乎要说成是毛主席早就估计到、安排好了的。仅仅把这一切说成是对毛的神话显然不够。我们自身的存在状态一定从根本上说就出了什么问题。暴力加上真理，恐惧加上盲从，但这也依然是后天训练而成；恐怕在以此种方式训练我们之前，我们就先已接受了某种看世界、看人生的范式——请原谅我在这里用了一个生僻的概念。我想说的是，一定有某种先于事物、事实、客观、问题的东西，正是这个东西才使得我们在事物、事实、客观、问题中看到了“暴力加上真理”的力量，认可了“恐惧加上盲从”的生存方式。

这范式就是阶级和阶级斗争，文革时具体化为两条路线的斗争。

把这个范式再具体一步，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一生下来就“先己”存在于某种你死我活的政治结构或政治格局之中。最早要你意识到这一点的就是成分与出身，它将伴随你的一生，而且决定着你每一步的荣辱。

谁最先提出阶级和阶级斗争，谁也就把不同意或对此表示犹豫的人置于阶级与阶级斗争的对立面的立场上；而自己，则等于事先预设了自己的正确与对“话语霸权”的垄断。政治是事关生死的事。想活，就得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就得不断地重新站队。一种很具体的政治秩序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秩序，而且它一直就处于某种紧张状态之中。这是铁的事实，任何意识活动都消解不了它。卡尔·施密特在《政治的概念》第二节中说，“所有政治活动和政治动机所能归结成的具体政治性划分便是朋友与敌人的划分”；“在道德上邪恶、审美上丑陋或经济上有害的，不一定必然成为敌人；而就朋友一词所具有的特殊政治含义来讲，在道德上善良、审美上靓丽而且经济上有利可图的，不一定必然成为朋友。”这就是政治所具有的以自身特定方式所表现出来的标准，而且政治必须以自身的最终划分为基础。他这段论述是1932年说的。其实早他6年，毛主席就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说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这里所说的“过去”，不仅指共产党在“过去”所领导的革命斗争，也指中国历史上的一切“革命斗争”；他们之所以成效甚少，就在于不能从根本上把政治的概念与真理的、审美的、道德的、经济的概念区分开来，所以才不能团结“真正的朋



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这里的“朋友”与“敌人”，如施密特所说，与真假、善恶、美丑、是否能够赢利全无关系。毛主席在1926年说出的绝对是一个经典的、完全属于现代性范畴的政治概念。比较一下柏拉图的《理想国》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加上孔子、孟子等等先人们有关政治、治国的言论，就知道这段话、这种意思是近代启蒙思潮以来才可能有的意识。而且主要是为了从宗教的也就是信仰的、道德的“枷锁”下挣脱出来，为人类为什么需要或只能过一种“团体的”（也就是政治的）生活寻求到一个新的说法。我们在文革时把这段话背得滚瓜烂熟，但其实不懂。所谓“不懂”，也指的是我们还不知道应该把“公敌”与“私敌”区分开来：“公敌”就是政治上的敌人，对他们，无真假、善恶、美丑可言；“私敌”只与个人存在着敌友关系，在这层关系上，你可以用道德的或审美的标准加以衡量，或者如耶稣基督所言，你也可以去爱你的敌人。

我们不懂，是因为我们没有从事如此实际的政治活动（我怀疑就是从事了也未必就能如此），但我们的生存本身却是被这样组织起来的，就是说，所有关系、问题、被发现的现象、被提炼出来的概念，都取决于你的阶级立场；也许后来家庭成分的重要性降低了，但政治依旧事关生死，而且取决于你上面那个以政治标准来划分敌友的“上司”如何看待你；真正消解着这一“政治标准”的，就是腐败，就是尽可能地把“公敌”转化为“私敌”，然后再把“私敌”转化为“私友”。当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旗帜不再飘扬了时，也就等于说“公敌”的意识淡漠了（尽管还有美帝国主义和“东突”的恐怖分子）；“公敌”的意识淡漠了，“私敌”从根本上说也就完全可以“化敌为友”。“出门靠朋友”，“冤家宜解不宜结”，这都是我们的古训。所以腐败也好，潜规则也好，说到底，就如毛主席他老人家80年前所说的那样，是因为我们没有了从政治上区分敌友的标准。

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在文革的年代里能那么清廉、奉公、昂扬、亢奋（那怕自己已被划为阶级敌人，但总有转变立场、重新做人的标准），而现在却在平庸与单调中委曲求全。

没有办法。想不到出路。我们重新检讨文革，唤回久已被遗忘了的记忆，难道不就是为了认识今天的现实吗？

## （五）

毛主席的存在，就是那个年代的现实合理性的根据；而偏偏又是毛主席告诉了我们现实的不合理；于是使现实重新合理的惟一途径就是重新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里面有两方面的要求，一是打倒刘少奇及一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再是把自己改造成“新人”。

前者是“集体欲望”的理性体现，后者是“个人欲望”的合理化要求。

人真的能成为“新人”吗？于是在我们面前就出现了一系列的“新人榜样”，如雷锋、王铁人等等，几乎使每个人都相信除了自己别人都是“新人”或正在成为“新人”的人，至少，所有的人在嘴上都是这么说的。

都这么说，也就真像有那么回事一样成了真的；我们的说，造就了我们所信以为真的现实，然后再把这样的现实当作“奇迹的结果”让我们相信“奇迹的存在”。这里的“奇迹”，其实也就是信徒们争论不已的“神迹”。我们那时比天下任何一个时代的信徒还要虔诚，原因就在于我们亲眼看到了太多太多的“神迹”。

按道理说，毛主席、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现实的合理性，这一切的一切，都只会起到一个“消灭偶然性”的作用；我们几乎不相信还有什么会跳出毛主席的掌心；然而又是毛主席，让

我们相信了太多太多的“奇迹”（神迹），从“亩产十万斤”到“超英赶美”，从“要消灭一切害人虫，全无敌”到“敢教日月换新天”。就是到了现在，我常常会在梦中笑醒，因为在梦中又回到了那个神话般的美好天堂，尽管一个月只有二十几斤粮食，不到半斤油票，一年到头就那么两身衣服。然而我们真的就相信自己生活在天堂里，整天想的就是去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正在水深火热中苦苦企盼着的劳苦大众。

你想想看，文革时几千万人在全国各地串联，吃饭不要钱，坐火车不买票；几百万人在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齐声喊“毛主席万岁”一喊就是一天一夜，这样的场面重复出现至少八次，生活这样的环境和气氛中，你能分得清什么是浪漫什么是现实吗？文革这种把几亿人变成一个人的实验，在人类历史上不但绝无仅有，而且空前成功。

所有这一切，要想让人不相信“所谓现实其实是人说成的”真不容易，因为我们就是在那样的现实中长大的，是在收音机、电视机、课堂里以及主席台上那些人所如此教导的话语中长大的。

到最后，我们终于发现我们没有了别的词语来描述另一种“现实”。

那个时候是这样，现在依然这样。我们没有多少话可说。所谓“乡愁”，也无非是想把一些一直沉睡着的或看不见的、被深埋着的词语（或意义）表达出来，让它们传达出另一些想象、幻想、愿望、企盼。

然而不行。

所以我信服某个人的一个说法：所谓自由，就是可以对自由进行自由表达；言论自由是一切自由与权利的唯一条件（康德语）

问题是，我们却忽然间没有了这种自由表达的愿望。还是在哪儿看到的别人的一个比喻：当贼心、贼胆、贼机会都有了的时候，贼却没有了。

## （六）

但不管怎么说，我们都是些曾做过“贼”的人。

从很小起，我们就知道“窃国”与“窃珠”的不同就在于下场的不同。这里面确实涉及到一个“正当性”与“合法性”的关系：“窃珠者”可以给自己找到许多“正当性”理由，但这些理由都不“合法”；“窃国者”却可以轻而易举地通过立法使自己的行为“合法化”。当然反过来看，世袭制、贵族制、宗法制以及私有财产的继承等等从根本上说所具有的就是一种“正当性”，而汤武革命、陈胜、吴广等等的事业却只能把“正当性”等同于“合法性”。

文革时我们开始造反，仔细想来，无非心怀一种“正当性”的观念；这“正当性”是毛主席给的吗？当然是。没有毛主席的撑腰，谁敢造反？但从内心深处的动机来说，这种“正当性”的依据就在于要“整那些以前一直整人的人”，换成经典一点的语言来说，就是“剥夺者的被剥夺”，“革那些革命者的命”。这都是当时常挂在嘴上的一些话，而且在中国这片大地上，又一直有着为这些话提供“正当性”依据的土壤。

“合法性”让人循规蹈矩，“正当性”给人激情，让人热血沸腾，视死如归。

所以那时候烧图书馆，砸石碑、门楼、牌坊、珠宝，都是“正当”的，因为它们不属于劳动人民。

有了“正当性”，根本就不需要“法”，而且从根本上说，“法”无非也就是起一个“障眼法”的作用而已。伟大领袖的个人魅力，一颗红心献给党的自我确信，就是无论怎么做都肯定“正当”的依据。

所以我们都“正当”地（光明正大地、气势轩昂地）做过“贼”，就如《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赞美过的那些“痞子”一样。

我们就如老一辈革命家最初造反那样（比他们自然安全多了，但目标也远大多了）重演了一幕揭竿而起、灭资兴无的“革命正剧”，个中之兴奋与快感自然让人以为一个崭新的新世界将在我们手中实现。

这种“窃”之“正当”，说到底是因为这是政治，是在玩政治，所以才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

而一旦“玩过政治”，知晓了个中的秘密与乐趣，事情就麻烦了。

“投身”的本来含义就是拿身家性命去“玩”事关生死的游戏。

准确的说，我们是在某种政治格局中长大然后又“玩过政治”的一代人。这就是启蒙，真正的启蒙：意识到自己的出身、立场，感受到恐惧与压迫，时时刻刻关心着国家大事、天下大事，因为你再不想关心，它也会破门而入。

也许，最好的就是正而八经地“招安”，给他们利益，让他们吃喝玩乐，或者，就此消沉，不再理会政治。

不幸的，就是当世俗的、功利的、媚俗的、技巧的风气已经使得虚无与相对成为一种半官方的意识形态，当人们已经越发感受到生活之贫乏单调，生存本身变得越来越没有意义，人终于把自己也变成了技术文明的产物时，那种抵抗的、怀疑的哲学就耐不住寂寞了。

什么叫“小市民”、“小资情调”？就是因为他们不关心政治，不关心国家大事。尽管文革时的“逍遥派”在今天已经变成了唯一正确的一“派”，但能在反思中使苦难成为一种抵抗技术化生活世界的力量的，毕竟不可能是一种“逍遥”的态度，甚至不可能是一种“纯学术”的眼光。

于是，开始了重读哲学史，重新审视自己的生存处境，开始了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对中西文化的比较，其着眼点不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逻辑学，而在何谓人类生活秩序之正当性、合法性，在进步之观念与保守之观念的区别，在人类生活中宗教或神秘主义的不可或缺，在中西哲人对时空的不同感受与历史观念在变更中的不同形态。

其实哪怕就是“朋友”“敌人”的政治架构，其形式也决不只限于“你死我活”。

38年过去了。历史上曾有过的那“富有命运特征的一天”怎么到今天还没有过去？什么叫“过去”？虽说哲学讨论的只是认识活动的形式特征，只在探究概念的意义而不必顾及经验与所讨论之物的物质内容，但我们真把它们分得开吗？

(七)

自我意识的最初阶段既然是欲望，鲧治水 9 年未果的原因既然就败在一个“堵”字上，那么反其道而行之就必须要把欲望合理化，或者说给欲望找到一种理性化了的发泄（满足）渠道。这也许才是毛泽东与黄炎培在 1945 年 7 月的“窑洞对”后，经过多年思索与实践才最后找到的走出“兴亡周期率”的真正“法宝”。

其形式就是文化大革命：一种按照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而进行的“全民发泄”，一种经过灌输而迫使你不得不萌生的事关政治的自我意识。

所以毛才说他一生就只干了两件事，才说这样的革命每隔七、八年就要再来一次。

让“乱”成为周期性的“正常”，这不就没有“兴亡”问题了吗？

这也合乎毛所理解的辩证法：不乱不治，乱中有治，对立统一。

让天下不得安宁（一座座火山爆发之类的话），让人自身也不得安宁（斗私批修之类的话），这其实就是安宁，或者说，就是毛心中“其乐无穷”的状态。

所以毛并不相信“新人”、“好人”、“人性善”之类的痴言，他不但要批判资产阶级人性恶论，也狠批孔老二的人性善论，这在今天看来倒真是火眼金睛。

人性中善恶各半，在天平上永远是平衡的；善要积累的多一些，先得要使自己这边重一些，而这在逻辑上就不通，因为它等于承认了善一开始就多（重）。这次美军虐待伊拉克战俘之事，更使人看透了人性之善恶参半，也明白了为什么会发生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之类的事。只要允许，人（无论是什么时候、何种肤色、那类制度下的人）其实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我们自己在文革中就参与或观望过不少类似的暴行。差别只在是否允许、是否有渠道让人说出来。说出来了，恶行就会收敛一些，事情也就好办一些。说到这里，“合法性”之循规蹈矩也就越发显得必要，尽管我们知道只有“正当性”才激动人心——而且我们相信那些最初把这些美军虐待的照片公之于众的人一定出自某种“正当性”的而不是“合法性”的理由。所谓的“合不合乎国际法”之类的话，都是事后的辩论，而不是当下的直觉。

托克维尔说过，对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就是开始改革时，就是允许公开时，因为尽管坏事可能会得到遏制，但人的感觉却变得异常敏锐，于是身边的坏事也就会显得越来越多。

我不知道美国政府算不算一个坏政府；我只知道与文革时比较，似乎身边的坏事正在变得越来越多，那时候可是真的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我已经听到了别人的笑声：因为那时候没有什么可偷、可遗。

是的。38 年前，在“那富有命运特征”的一天里，200 里路，三轮汽车跌跌撞撞地走了将近 5 个多小时。到华县时，尽管天已经快黑了，但我和母亲谁都没有过是否安全的念头。其实最大的安全问题就悬在我们头顶，只不过我们都不意识到而已。

意识到的，只是一个小县城给我的第一个感觉，那就是闪烁着的小油灯，而县城外面，暮色茫茫，炊烟袅袅。

我知道我到家了。

2004年5月16日，沪上新居

~~~~~

## 【口述历史】

### 那一夜惊心动魄——913事件追忆

• 康庭梓 •

解说——《凤凰卫视》“口述历史”节目解说人

讲述人——林彪专机副驾驶员康庭梓

解说：34年前，1971年9月13日，在蒙古温都尔汗草原上空的一声巨响震惊了中国，震惊了世界。林彪坠机事件留给后人许多难以破解的谜团，也强烈冲撞着那一代中国人的心灵，一系列荒诞、迷茫、强撼、沉重的复杂情感，至今萦绕在那一代人中国的心中。亲历这样的历史事件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不过恐怕可以唯一肯定的是，小人物的命运就此随着大人物的命运，大事件的发展开始起伏跌宕。康庭梓是“林彪座机”三叉戟256号飞机机组成员之一，他直接参与了9月12日晚由北京飞往河北省山海关机场的飞行活动，他也亲眼目睹了9月13日凌晨林彪等人从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的全过程。在他的记忆里，913事件发生之前的那个周末则是正常的，平静的。

康庭梓：就是一个军人在这个营房里边，度过了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很轻松的假日。

解说：1970年前后的中国正进行着一场以在思想和文化领域的革命为初衷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这是一段将政治理念与现实生活结合得紧密而彻底的特殊历史时期，从普通百姓到国家主席刘少奇都受到影响。1969年4月，中共第九届党代表大会召开。大会修改的新党章中明确提到“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林彪的政治地位也以文字的形式正式确立下来。1970年的庐山会议（即中共九届二中全会）被普遍认为是林毛关系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二中全会上时任中央文革组长的陈伯达等人提出恢复国家主席的职位，这个提案被认为是林彪企图夺权的重要一步，因为设立国家主席后，作为当时中国政坛“二号人物”的林彪就能够确保自己在主席去世后成为国家无可争辩的元首。有关“设国家主席”和“称毛泽东为天才”的两点意见后来被中共定性为反革命政变的政治和理论纲领。不过，对林彪驾机离开的真正原因至今没有统一的答案。1971年9月11日之后，林彪就再也没有公开露面。

康庭梓：那是在9月12日下午6点10分左右，我记得很清楚，吃的那个蒸饺，我把蒸饺都盛好了，我们那个大队值班室的人员就进去了，就点着我的名字就喊，快回去，有紧急任务。

解说：在康庭梓简单的思维当中，有一种最纯朴的战士参战执行任务的荣誉感。康庭梓是当时中国唯一的三叉戟飞行中队的中队长。中国在1970、1971年先后从巴基斯坦引进了四架三叉戟，其中256号三叉戟就是由康庭梓带领一个机组前往广州白云机场进行验收之后，飞回北京的。康庭梓也许永远无法想到自己亲自接回来的这架代号三叉戟日后的处女飞竟是一次死亡之旅。

康庭梓：256飞机是这4架飞机当中最好的，就是从改装来看，也是最好的。这架飞机实际上就是叫做，我们通常说的叫专机，

解说：康庭梓驾驶三叉戟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执行的任务还是不少。在那个历史时期，能够成为中央首长专机组的成员，负载着一份特殊的使命感。和康庭梓一样，被这种纯粹的荣誉感和使命感包围的还有他的战友，林彪专机的9名机组成员，其中包括机长潘景寅、副驾驶陈联炳和三名机械师李平等。在接到紧急任务的命令之后，全体的机组成员立即行动起来。

康庭梓：当我往回跑的时候，我还没有到飞行大队那个办公室，我就看到那个谁在，李平，刚才介绍了，李平就我们的机组机械师，他就开始向机场跑。他就给我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很关键，他说潘副政委（潘景寅）告诉我，要把油料加到16吨，要把飞机的油料加到16吨，这是个很重要的信息。我当时听到这16吨油的信息以后，我马上一愣，因为我脑子里边是林彪从北戴河回北京，参加国庆庆典的，300公里，半个多小时就到了。16吨油当时是三叉戟从北京飞广州的油量。他一告诉我16吨，我马上就意识到，哦，不回来呀，不到北京了，怎么加这么多油干啥呢。

解说：准备就绪的256号三叉戟静静地等候在北京西郊机场的停机坪上。此刻，机组人员并不太清楚这次有哪些人乘坐这架飞机，而且飞向何方。7点半钟，一辆蓝色的伏尔加驶入了机场，从车上走下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和随行人员。康庭梓回忆说，机组抓紧了一切时间登上飞机，按照业务岗位各就各位，这之后，飞机从西郊机场起飞，前往目的地山海关。

康庭梓：我从那个中间隔断那个门儿能看到林立果和刘培风坐在那个茶几的两边在那说话，我的眼光正好是可以看到林立果的面目，就在他们说话的过程中，他可能一转头，发现我就在那个沙发那儿坐着，他就不吭声了，当时就不吭声了，而且面目特别严肃。

解说：飞机经过半个小时的飞行在山海关平稳落地。林立果礼节性地同机组成员握手，并且叮嘱道：“人民解放军的战士要听林副统帅的话。关键时候要起作用。”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番话，在康庭梓听来，在所有机组成员听来，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当时，林立果基本上就是以他父亲林彪的名义出面。而林彪从1966年8月1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改组和调整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之后，就一路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在飞机降落山海关之后，机组例行公事，对飞机进行检查，开总结会。机长潘景寅再次交待把油量要加到17公吨，同时还在会上提到了路线斗争的问题。

康庭梓：我一听当时就感觉出来，好像又要谁被揪出来了，潘景寅话就说了一半儿，他就不往下说了。他往下说的是什么呢，他就说明天早上咱们6点起床，6点半吃饭，吃完饭到机场就准备飞机，那就是说时间安排。就是有行动的话，不就是明天吗，他是这个意思。

解说：山海关挨着海边，虽然只是9月中，却也是夜深风凉。在这个夜晚，大部分机组成员都进入了梦乡，为第二天的飞行任务养精蓄锐。康庭梓回忆说，机长潘景寅没有睡，他同林立果的随从程洪珍在一起聊天，直到子夜时分一个电话响起。

康庭梓：12点05分，潘景寅接了个电话，就命令那个调度室主任，马上给山海关车站要油车，开始给飞机加油，马上要油车。然后潘景寅出来，就把三个机械师叫起床，我就睡在隔壁，但是我一点儿动静都没听到。我们在外场执行任务都是这样的，一哄而起，没有说是几个人走了，把几个人再留下，没这种现象，因为大家都是一个集体。现在看，唯一的一种可能就是当林立果决定北逃的时候，他就不需要机组这么多人了，机组越少越好，因为让机组在空中要是知道他叛逃的阴谋的话，机组肯定会反抗。

解说：就像人们对林彪突然坐自己的专机离开感到相当震惊一样，机长潘景寅一个人驾驶着必

须有几个人同时驾驶的专机升空，这一事实也让人非常震惊。为什么潘景寅只是叫醒了 9 名机组成员中的三名机械师和他一起执行这样一次非常特殊的任务呢？潘景寅到底是不是事先已经知道这次飞行计划的真正目的？他究竟是不是林彪叛逃计划的知情者？

康庭梓：他（潘景寅）当时真以为有人在陷害（林彪），在关键的时候我出面来捍卫副统帅，那不是很正常吗？所以说他就完全听从了林立果的安排，机组不能都上。他就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潘景寅才这样做的，而且潘景寅的这种安排，从现在看滴水不漏，他在时间上卡得相当好，正好林彪车来以后，他也出来奔上飞机去了，他只要一上飞机，那就有人驾驶。林彪车到了以后，我当时没看到，可是海军的地面人员看得很清楚。第一个从车上下来的就是叶群，因为叶群是唯一的一个女的，而且没戴头巾。她下车了以后就喊，这个有人要陷害林副主席，我们要誓死捍卫林副主席，现在有情况，我们要马上走。

解说：当时场面虽然混乱，还是有人观察到一些不正常的现象。机组中一名叫邵起良的成员就警觉地意识到为什么林彪都到了，机组还有五人没到？

康庭梓：当时他情急之下，就把机场边上一个电话抓起来了，这个电话就是为了保证专机，山海关机场临时安置的。他拿着这个电话是分机，就接到我们那个调度室主任那屋，第一句话就说，首长都到了，机组怎么还没来，这个时候我们那个调度室主任才知道我们还没上机场，他慌慌忙忙出来，梆梆梆，敲我们的门。这个时候我啥也没顾，我就赶快往机场跑、我脑子当时想的就是，我们都没起床啊，机组都在这儿，谁把飞机飞走了。正在这个时候，我看到有一辆中卡，上边全是荷枪实弹的 8 3 4 1 的部队，咔嚓就停在停机坪那了。有人就喊，“开枪”；有人喊，“不准开枪”。当时我是肯定听到有枪声。等飞机开始滑跑，起飞的时候，大家都傻眼了，都站那看着，就看着飞机呼呼呼向西南方向就起飞了，很短时间就看不见了。我身边就是领航副主任，很习惯看一下表，零点 3 2 分。

解说：2 6 5 三叉戟在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之后，出现了一个很不正常的航迹。飞机起飞后先照直飞行了 4 分钟，之后用极缓慢的动作转弯，3 到 4 分钟之后，才稳定到 2 7 0 度的航向上，就是对着正西，北京的方向。飞机在这个方向平飞了 3 到 4 分钟，然后又开始增大航向到 3 1 0 度，向西北方向飞去。接下来继续转弯到 3 4 5 度后，又最终调整到 3 2 5 度左右的航向。完成这个动作正常情况下只需要 2 分钟，机长潘景寅则用了接近 2 0 分钟的时间。此刻飞机的实际位置已经偏离正常航线西侧约 1 3 0 公里，这种加入航线的动作，对飞行员来说是不可思议的。

康庭梓：这些转弯痕迹，这是客观雷达给留下的，这个不会有任何怀疑，但是为什么会形成这个转弯，这里边很有名堂。我是这么认为的，第一阶段，就是说从起飞到 4 分钟，这一阶段为什么没转弯，我的判断是因为潘景寅根据多次加油，我知道飞机要往广州飞，他知道广州的航线，但究竟到广州干什么，我估计他不知道。所以说，他认为要飞广州的话，没必要转弯，我就直接飞就行了。但是呢，实质不是这样，实质是林立果让他叛逃。4 分钟以后开始转弯的时候，潘景寅是很不愿意转的，因为它这个决定他命运的一个转弯。虽然说转弯很慢，从动作上很慢，但是作为他的命运来说应该算是急转弯。他不可能想象到，原来我这么干，你就是让我跑，叛逃。

解说：没有人能够知道潘景寅在飞机强行起飞后做出的这一系列不正常的转弯轨迹背后，到底蕴藏着怎样的玄机。有一种说法是，飞机在起飞之后本来是想拐回来落地，但是因为周恩来总理发出了禁空令，机场的跑道灯已经关闭，跑道也已经封锁。所以飞机在空中划了个问号之后，再一次飞走。康庭梓认为这种解读听起来有些离奇，但不管怎么说，2 6 5 号三叉戟在空中留下的的确是一个值得思索的真正的问号。

康庭梓：当时三叉戟黑匣子那个语音记录器，只能记录从发生爆炸，就是终止前半小时的这个语音情况，再往前的自动就抹掉了，也就是说它能保证能够读出来的，只有半个小时。按当天晚上飞机叛逃的情况看，也就是说飞机从出境以后，一直到爆炸，迫降爆炸，这么一段的情况，它能够记录下来。所以说即使潘景寅没有开无线电开关，当时前舱互相之间的那些讲话，出境以后在空中，他们之间是不是发生了一些争吵，都谁说了话了，还是能够从那个语音黑匣子能读出来。现在这是目前弄清256飞机空中情况的一个最好的一个证据，也是一个唯一的证据。现在谈到黑匣子了，我想谈谈有一个我的观点，就是说在整个飞行的过程中，林彪和飞行员潘景寅之间有没有直接接触。

解说：256号飞行了大约两个小时之后，在蒙古肯特省会温都尔汗东北60公里，一个叫做苏布拉嘎的盆地坠毁。在事故现场共发现了9具尸体。其中的两具经过前苏联医学专家的验证被证实是林彪和叶群。关于林彪座机如何坠毁，说法五花八门。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一是“256号”三叉戟空勤人员，在飞机上反劫机，导致飞机迫降坠毁；二是飞机被驻蒙古的苏军导弹击中，最后迫降失败；三是飞机被中国导弹击落；四是人为破坏。也就是这架飞机在起飞前被安放了炸弹。而康庭梓认为飞机是因为燃料不够，紧急迫降时机身擦地，点燃了机翼中两吨半的燃油而发生爆炸。

康庭梓：到山海关在做飞行检查的过程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又是油量问题，这个必须再次说明。在做飞机检查的过程中，潘景寅直接告诉李平，说呆一会把飞机的油量要加到17吨，在西郊的时候加到16吨，结果加到15吨，到山海关的时候，他又交代油量要加到17吨。17吨油当天晚上没有加进去，为什么呢？三叉戟飞机与别的飞机比有个先进的地方，就是不需要在机翼上边往油箱里加油，是可以用一个特殊的接头从机翼的下边通过油车的压力，直接把油加到油箱里头去。因为山海关那个油车与我们自己带的那个压力接头不配套，所以当天晚上没有把油加进去。当时飞机上还有多少油呢，还有12吨半油。这个很重要，这个12吨半油就决定了256飞机的命运。为什么潘景寅当时不知道飞机上究竟有多少油了，因为他飞行的高度不合理，飞行的速度还不合理，这时候没法计算是究竟一小时要消耗多少油量。我算的油量是这么回事，就是说他在这样一个高度上最多消耗5吨油，每小时5吨油，所以说你看，到温都尔汗，1100公里，据说是两点半坠毁的，零点半起飞的，你看两小时，一小时5吨，10吨油没了，剩下的就是两吨半油。所以说他飞到温都尔汗的时候啊，他就不敢往前再飞了在那个地方就开始寻找迫降场，最后在温都尔汗东北60公里地方坠毁的，也就是说他是在油量不够而决定迫降。而且在油量又没有烧完的情况下，插地，爆炸的。

解说：坊间曾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说毛泽东在被告知林彪叛逃事件的时候，说了一句颇耐人寻味的话：“天要下雨，娘要改嫁，都是没有办法的事，让他去吧！”毛泽东在1966年7月8号给江青的一封信里自称是黑话的信里曾经这样写道：“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掐指一算，林彪在文革当中从登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子直到他最后以极富戏剧性的模式身首异地的收场也不过短短5年，所以说不管历史如何评价林彪，不管他是叛逃，还是蒙冤，林彪在文革期间的命运倒还真是应验了毛泽东的这每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的大规律学的预言。林彪坠机事件之后不久，林彪的主要支持者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因为“不向中央作任何揭发、交待，而且活动频繁，毁灭罪证”，被下令离职反省，交待问题。长时间由林彪及其支持者主持的军委办事组于10月3日被撤销。叶剑英受命主持新成立的军委办公会议。同日，负责审查林彪、陈伯达集团的中央专案组，也由周恩来牵头成立。政治风云中人物的命运就此定格，而被动地卷入这场历史事件的当事人又面临着怎样的命运呢？

康庭梓：我们就这么等着，一直等到9月14号的下午，山海关车站通知我们回北京，就让我



们回去。怎么回去呢，人家有两个人，两个海军看着一个空军，上了卧铺，就山海关那车站，卧铺，每个人一个单间，直接到北京站。到北京站没有按正常的出站口出站，人家的吉普车就开到那站台上，同样是两个人架着我们一个，在那个吉普车上，把我们拉到当时海军司令部的后院，就现在的翠微路。在那里，可能是一个家属招待所，都把我们安排在那。当时我们坐在吉普车上，经过天安门广场的时候，我同样看到灯火辉煌，一片繁荣景象，但是我当时就意识到，这么大的事究竟和这个有没有什么关系。我家就在天安门广场西边不远的一个胡同里，住的平房，我当时就觉得，你看，我家离这么近，家里还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估计短时间是回不去了。

解说：一星期之后，康庭梓和其他 4 名机组成员被送往中央专案组。1976 年，康庭梓被宣布停止飞行资格。

康庭梓：当时受审查的这些干部，主要的干部，大约有 60 多人，这 60 多人凡是空勤干部，基本上，就是都停飞了。走出学习班的时候，都没有再回到飞行岗位上来。我当时还是很想飞行的，我说我刚飞三叉戟，而且当时三叉戟也很缺人，我就给领导，给师长他们写信，就是能不能把我留下来，看来这些都无济于事，都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解说：1981 年，中央撤销对康庭梓“犯方向路线错误”的文字结论。同年，坠机身亡的潘景寅和三名机械师家属接到“病故通知书”。

康庭梓：病故通知书，当时说是什么呢，就是赶快让潘景寅爱人赶快签字，就是把这个通知接下来，就是说是一个是时间等不及了，第二个就是当时找不到所谓因公死亡通知书，说只有拿这个病故通知书来应付一下。现在看这实际上就是在当时那个情况下，也能争取到这种正常死亡，不是叛徒，也不是烈士。那就是很不错的了，决不会给你一个因公死亡的这么个证明的。

解说：1984 年康庭梓结束了在转业分配地河北沙城的九年生活回到北京，开始找有关人士了解 9·13 时间的相关材料，着手撰写 40 万字的回忆录《亲历“9·13”事件》。因种种原因，康庭梓的回忆录《亲历 9·13 事件》尚未出版。

□ 摘自《凤凰网》凤凰卫视节目“口述历史”  
~~~~~

【难忘岁月】  
  
《风雨人生路》转载（之十二）  
  
• 刘文忠 •  
  
服刑市监狱

押解我的警车，驶出第一看守所大门，一路恐怖、凄厉的警笛惊颤人心，沿中山南路至中山东路环行，进外滩大道，穿外白渡桥，奔大名路，很快抵达杨浦区的提篮桥，到长阳路口贴近一堵五米高的深咖啡色的大墙边，墙上挂着一块巨大的长方形白底木牌，上面五个斗大黑字“上海市监狱”突兀眼前。这时，两扇蓝灰色的大铁门洞开，由门口站岗的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指挥，警车缓缓开进监狱大门，到大院子里停下来。从此开始了我在市监狱大墙内服刑的生涯。

人类把监狱视为最严禁、最低层的特殊场所。我国古人早已有道：“画地为牢，势不可入；

削木为吏，议不可对。”牢狱与世隔绝，监吏就是王法。西欧过去有座世界闻名的巴士底狱，外国文学名著中许多处描述了它的超级严禁、极度黑暗，以及摧毁人权、人性的种种酷刑。我国这座提篮桥监狱，始建于1903年，闻名亚洲、远东。“进提篮桥”成了“坐监牢”的民间俗话。在解放前这里是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华德路西牢，曾监禁、残害了多少共产党人、革命志士与无辜的平民百姓。上海解放，新中国建立，提篮桥监狱也回归到人民政府手中，情况当然今非昔比，然而由于毛泽东阶级斗争理论威力越来越扩大，55年起这里关进了“胡风分子”，57年一批“顽固与人民为敌的右派分子”被投入进来，包括上海人民敬仰的解放前共产党地下特工领袖、解放后任上海市副市长的潘汉年，及其一起的市公安局局长杨帆。66年文革兴起，监狱成了“阶级斗争的工具”，提篮桥监狱更是充分发挥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无比威力，上海乃至华东地区大批新老反革命分子纷纷被关押这里。当我铐着双手押解到时，大墙内早已人满为患，而阶级斗争的烈火正在服刑犯人间熊熊燃烧。

不久，经过老犯人的介绍，以及自身目睹观察，我对市监狱有所了解。坐落在提篮桥地区的这座大监狱，占地六十多亩，四周团团高墙加电网围住，成为名副其实的“铁窗”。临街一律在窗外装有遮蔽眺视的乳白色玻璃屏障。从大铁墙门到牢房，要经过六、七道铁门，每一道铁门都由监警锐利的目光守卫注视着。警卫室内装有监控设备。在牢房大楼里，每一层楼面都似长方形的“回”字，中间是南北背对一溜45间监房，四周是又长又宽的“回”字形走廊。走廊中段是楼内天井，从六楼可以望到底层，由底层可以看到顶楼空间，但每一层都密布厚厚的钢丝网。监房一间毗邻一间，从走廊尽头望去好象口琴上的小方格。每间监房规格统一，房门是铁栅栏，全透视，门外走过一目了然。房内四平方米，长方形，地上铺木板，每间只能睡三个人。犯人日常生活也有狱规，如白天必须把被褥折成方块，整整齐齐迭在一起，三床有棱有角的被褥高耸墙角，粗看像一个床头柜那般。每天有楼面事务犯来检查，并标出“最优”、“最差”内务标志。犯人替换衣服及一切多余物件集中放在最后几间储藏室。长长的走廊是同层犯人活动的场所，上午九点开始，下午一点开始，每次二个小时的学习或劳动。犯人需在政府管理人员把牢房门“咔嚓”打开后，听事务犯通知才可走出房门，到回形长廊活动。各层楼面的楼梯口都装有铁门，非经许可，不得出入。每个楼面的事务犯，我们通称他为“队长助手”，他有相当的授权，一般是由政府管教队长所信任、且案情较轻犯人积极分子担任。

市监狱内的服刑犯人，都按罪行性质编队分关各楼。我刚进去的一段日子里，一号楼是重刑犯中队，二号楼是刑事犯中队，三号楼是反革命中队，六号楼是新犯入中队，八号楼是病号犯入中队，九号楼是女犯入中队。十号楼用作市监狱医院，其它一、四、五、七号楼都是市监狱的各工厂劳动中队，犯人们在劳动工厂监督劳动，活动场地比关在楼层的要大得多，但一般仍穿囚服，胸前都别着一块“番号布”，写明犯人的编号。监狱工厂里有组装电子元件的，做手工艺品的，做服装裁缝的，还有一个印刷厂。尚未被分配进这些工厂的劳动中队人员一律每天拆纱头。

大墙内设有小卖部，规定犯人每月可以登记购买，称之为“开大帐”。不仅能买到一些日常生活用品、文化用品，还能买几种食品，如酱菜、水果糖、麦乳精、鱼皮花生等。犯人一般每月可以与外面亲属通一次信，每月有一次“接见日”，同来探监的亲属会面。接见厅当时设在大礼堂，内有一排三十多米长的桌子，桌面宽一米半。接见时，二十几个犯人一组坐在长桌内侧，亲属们则坐在外侧。每次可与亲属交谈二十分钟。这往往成为犯人们每个月最激动的时刻。凡是这里的新犯人，一般在区县看守所起码关押一年多以上才判决，而在市级一所二所关押的时间会更长，往往三、四年后才判刑，在这长期内是见不到亲属的。所以在市监狱新服刑的犯人第一次接见亲属，情绪格外激动，痛苦更为暴露。那种长期骨肉分离，骤然片刻团聚，若即若离、难分难舍的复杂痛苦交织莫名。探监的亲属往往禁不住热泪横流、哭叫声声，而犯人大多饮泣悄声，以泪洗脸。接见倏然到时，监警催促无情，面对亲属的拼命呼叫叮嘱“当心身体，好好改造”、“家里很好，不要挂念”，每个犯人内疚万分，惭愧难安，一边离开接见室一边频频

回头、泪眼目送亲属的背影。记得我进市监狱后，第一次母亲与姐姐来探望我，眼望白发苍苍的母亲老泪纵横、饱受惊吓的姐姐泣不成声，我自己内心似万刀绞割，百箭穿刺，竟然说不出话来，只是自扞默思：究竟是谁使我们家生离死别呢？当夜我又失眠通宵……。

如果说看守所重在审讯，那市监狱则重在改造，对犯人改造的主要手段是办学习班。我这样新进的服刑犯，都必须在六中队参加学习班。这里有各种各样的分类学习班。分为：刑事犯、反革命犯、重刑犯、死刑犯、青年犯，而杀人犯、强奸犯、偷盗犯、诈骗犯、抢劫犯等则归入专题学习班，还有“重新做人学习班”“悔过自新学习班”、“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学习班”等等。学习班的教材是毛泽东著作中有关对阶级敌人论述的语录、文章，学习班的形式是批斗、批斗、再批斗，从头至尾“逼、供、信”。文革时凡是社会上时兴的“全武行”批斗方式方法，全盘搬进了监狱，在各种学习班上广泛采用，弯腰90度、喷气式、挂牌、殴打……。我参加学习班期间，有四五人组成的中心组成员负责。他们是由政府从犯人中挑选出来的有文化有组织能力的人，包括每楼面的组长、记录员，而他们又受市监狱管教科直接领导，当时我记得其中二个负责人，一个姓刘是老干部，60多岁军人，据说是军队搞政工宣传的，副军级；另一个姓应，50多岁，旧市委秘书班子中的处级干部。学习班的具体内容，也是结业成绩，就是每个犯人检举揭发、立功赎罪的表现。这时的政府管理层认为，每个犯人即便已判决服刑，都有余罪，或多或少，或大或小，必然案中有案，大闹蟹一大串。凡是坏人，尤其是反革命，绝不是孤立的，他们必是团伙、群体作案，臭味相投，互相包庇。比如，你在作案时，你的家人、好友不可能不知道，不知情；你犯罪后他们表过什么态？说过什么话？每个犯人必须在学习班中老实交代、揭发检举自己所有熟悉的人，对文革、对社会、对毛主席与他亲密战友、夫人的不忠、不满言论与行为，重到防扩散言论，轻到思想上灵魂深处一闪念，都要和盘托出，竹筒倒豆子，一粒也不漏。有经验教训的犯人，在学习班中实际是避重就轻，态度诚恳老实，坦白交代多多，一大堆鸡毛蒜皮，蒙混过关；没有经验、一心想立大功的犯人，则是尽说纲上线上防扩散事，马上受上面重视作典型靶子，越坦白越挨斗、越逼挤、迫使他越疯狂乱咬乱讲，甚至大义灭亲，揭发老子妻子，案中揪出更大案，坦白交代永没个完。每期学习班最后由政府管教队长作统计、评比：每个楼面交了多少余罪？揭发了多少坏人？挖出了多少新案子？于是庆功、表扬、记功、示范演讲、宣传推广。楼面几十块黑板报上天天有爆炸新闻：三楼西四组揭发了一件杀人案，四楼东三组检举了某高校反革命集团涉及18人，二楼西六组一个年青的盗窃犯揭发了自己父亲写过反动标语，五楼东二组一个杀人犯揭发自己兄弟包庇他。几个月学习班结束，四、五百名犯人起码有上千份揭发检举材料上交监狱领导即转市公检法，于是轻的批交各工厂企业、学校、街道里弄执行对涉案人隔离批斗审查，重的则由市及区县公安局出动搜捕，把他们投入牢房。

利用犯人整犯人，是学习班中又一突出成就。如利用刑事犯整反革命犯，又用反革命犯整刑事犯。我后来了解到，原先一所胡兄之死，就是在我出狱后，被在市监狱学习班的同牢人为立功赎罪而揭发的，检举告密胡兄为首恶毒攻击，我刘文忠起劲配合，所以胡兄遇难，我也“二进宫”再判刑七年。

### 记录手发抖

按照市监狱法规，新犯人学习班“毕业”，分批分期发配到新的服刑劳改地方。最远的去新疆、青海农场劳改，其次去安徽白茅岭、军天湖农场劳改，近的到市郊几家劳改工厂，如劳动钢管厂、劳动板头厂，最近是留在市监狱内各工厂车间劳改。这主要看你罪行轻重、在学习班的揭发告密成绩，来决定你发配的远近。凭我五、六年老政治犯资格，已经学会在改造场所封闭自己思想观点，伪装成驯服接受改造态度，监狱管教队长看我身体残疾，品格本分朴实，很有文化素质，能跟刑事犯作斗争，又知道我在原单位搞过统计、宣传工作，对出黑板报、编写、记录等工作熟练内行，所以没有发配劳改，而留在市监六中队当记录员和出黑板报。

在一期所谓“重新做人”的反革命犯学习班上，我一边记录一边握笔的手嗦嗦发抖，内心灵魂在淌血。主持学习班的犯人头头一开始就宣布：

“现在给大家一个立功赎罪的好机会，大家主动自觉坦白交代，在自己犯罪过程中，在自己拘留审查期间，凡是与自己有牵涉或没有牵涉的，只要看到听到的反动言论、反革命言行，彻彻底底‘竹筒倒豆子’，完完整整坦白、检举出来。政府会根据你们各人的实际表现，减轻罪行。大家要争取立功减刑，尽快重新做人。”

主持人开场白讲完，全场默然片刻，寂静无声。这时旁边监视的管教队长沉不住气了，或许早就策划安排，他从材料袋里抖出几份材料，点了一个姓王的中年政治犯名，指着材料说，他隐瞒了余罪，别人的揭发材料已转到这里，他极不老实，说着掷出一付手铐，“哐啷”一声把他铐了起来，惊得大家目瞪口呆。主持人又说了：“谁不迅速、争先、坦白交代，顽固不化，就让他尝尝无产阶级专政的滋味！”

队长读了这位姓王的中年犯人被人揭发说，过去在某县拘留所与同关的青年人在私下说，乡镇干部都是土皇帝、贪污犯，比解放前国民党、地主还坏。类似性质的反动言论还很多。这个中年犯人顿时吓得面色刷白。主持人喝令他站起来低头认罪、并坦白交代为什么要恶毒攻击农村社会主义制度？中年犯人抖抖嗦嗦“我……我没有说过。”几个上期学习班毕业的积极分子在队长默许下冲上前去揪住他的头，把他双手反架成喷气式，痛得他“哇哇”直叫。半个小时下来，被弄得精疲力竭的他只好承认他曾讲过这些反动言论。主持人笃悠悠地巡视大家：“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们不要学他的样！”接着，不少人争着表现，揭发了一桩又一桩“听到过”“看到过”的反动言行，有的讲的激昂慷慨，疾恶如仇。良心正直的人一听就知道他在揭发平日里的仇人、冤家，包括想整他进来的单位领导、朋友、甚至亲戚，似乎在说“你们不让我活，我也要你们死！”犯人们为了立功减刑，尽快学习班过关，拼命云天雾地的抛出耸人听闻的“材料”。反正政府只要材料，不追查“诬告”。所以他们讲话全然不计后果，似乎原生活在他周围的全是一群反动分子、反革命分子，不管是单位同事，还是平常至亲好友。我一边不停顿的记录（因为自知稍一停顿，主持头头的眼睛就瞟视我这里，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要命的！）一边心里默想：文革啊文革，多么残酷地败坏了社会风气，驱使人心堕落，道德沦丧，使人的善良窒息，而邪恶毕露，人与人之间传统常情荡然无存，留下的却使大家变成了“狗咬狗”的兽类……。在狱中，对每一个囚犯来说，“贪生”可能是最强烈的欲望，狱政管理的许多做法措施，正是利用了这种欲望，犯人们知道这里鼓励告密，对他人有重大的检举，自己可获减刑。于是，告密成风，人变得更坏了。

一天，楼面队长派我一个临时的政治任务，说三组有个流串惯偷，交代检举了一个重大的反动集团组织案件，涉及到很多人，案情十分复杂，叫我去帮助笔录一下。我奉命跟随，前往执笔。这个流串惯偷犯姓徐，21岁，文盲。他8岁父母离婚，抛弃他，从此开始流浪街头。以捡破烂为生，常自小偷小摸，即使能在熟食小摊边偷吃一只馒头也很开心。后来，他认得一个安徽淮北来沪拾荒兼偷窃的老头，拜他为师，开始走南闯北，据说他跑遍了大江南北许多省市，头脑聪明，手脚灵敏，偷盗技术一绝，自吹成百上千次偷盗从未“失风”过，不料最后一次在上海闸北共和新路一家厂里盗窃金属材料时被逮住了。他见我随管教队长来给他的检举揭发作记录，表示很高兴，因为他知道队长表扬了他，鼓励他立大功，争取减刑，早日出狱，再过那自由自在的偷盗生活。

“我揭发！”姓徐的青年惯窃边说边站起来，恭敬地向管理队长鞠了个躬。队长摆摆手，叫他坐下讲，详细点，有名有姓，都要记录在案，算他立功表现。他得意地坐下，不由自主地手舞足蹈、滔滔不绝地揭发说：

“我在安徽山区拾荒流串期间，一次与我师傅露宿在一座破庙里。有一天夜晚，同伴们都出去‘做生活’（偷盗），我因身体不适独自蜷缩在破落的关老爷坐像背后。大约九、十点钟，忽然听到有不少人陆续来破庙的脚步声。我露出半个头悄悄偷看，才知他们是一个帮派，穿着也像我们差不多破旧衣衫。我看见一个白胡须老头带头向关老爷磕头，我师傅也在其中，然后转身向大家宣布，‘穷人党现在成立’。大家一齐拍手，然后由那个头头带头高举左手，其余同样举手，跟着他‘宣誓’要忠于‘穷人党’，要服从台湾蒋委员长命令指挥，要打倒县、镇、乡的干部，要推翻共产党……”

“慢点说，慢点说。”管教队长插话打断他，“这个情况非常严重，你要具体说清楚，那个头头是谁，他们一帮子人又是谁？后来情况怎么样？”队长又朝我吩咐：“认真一字一句记下来，切不可遗漏一点重要敌情。”我只能说：“放心，队长，保证字字句句实录下来。”

这个青年惯偷拿起搪瓷杯喝了口水，顺顺喉咙，兴奋而神秘地接着道：“队长，我有意留心看了那个为首头头的脸，不看也罢，一看吓了一跳，原来就是常混在我们拾荒同伙中的老张头。我曾同他一起做过几件‘生活’。他十分老练，手段高明，据说早年，大约解放前后，曾是一个地主人家的师爷，还是地方上一贯道的小头头，后来地主被打倒，他流落为江湖拾荒者，而他手下的那帮人，大多数是我们捡破烂队里的，本来成分都为地富反坏右分子。我当天夜里躲缩着，不出场去拆穿他们。后来时常遇到这批拾荒同伙，也遇见了老张头。我越看越发觉他们行动诡秘，常常鬼鬼祟祟地躲在墙脚角落里，口里念念有词，不知道在念啥符咒。我不敢上去同他搭讪。日子长了，我从师傅嘴里知道，他们有反动纲领，有宣言，直接由美蒋派遣特务领导。据说那个老张头已被台湾方面委任了个什么‘少将’还是‘中将’的官衔。后来又听说，由于他们不断暗中偷盗，并拉拢腐蚀一些乡镇村干部，不少干部也参加了他们的‘穷人党’。其中有一些武装保卫干部，他们有枪支炸药，据说，台湾方面已从飞机上空投了一批武器给他们。在我离开那里的时候，听说他们‘穷人党’已吸收了上千人参加，成了当地山区一支很大的反动组织……”

我越记录越感到玄乎、迷蒙，简直是“天方夜谭”，而那个徐惯窃却不刹车，口若悬河地离奇发挥。管理队长兴奋异常，一再夸奖他“立了大功”，要他仔细回忆那“穷人党”的具体人名。徐惯偷竟然一个一个报说，揭发出来张三李四王二麻子，三四十个有名有姓有地点的人物。这样连续“检举揭发”了足足五天。我不由想起了曾观看过的反特影片《徐秋影案件》，解放初年一个国民党特务潜派到东北某山区，组织了一批反革命暴徒暗杀共产党领导、阴谋爆破工厂……。怎么解放了二十多年的安徽山区也会有这种奇闻呢？有次趁管教队长离开上厕所，我悄悄问徐惯偷，你看过影片《徐秋影案件》吗？他说：“看过”。我又问：“你检举揭发的是否完全属实？”这青年犯人严肃地回答：“在政府队长教育下，我要深挖，要用阶级斗争眼光分析，有点出入没关系。”管教队长自以为在阶级斗争中抱了个“金娃娃”，自己管理犯人工作有方，建立大功了，揭发“穷人党”材料很快上报，直送市公检法。据说十分重视，派了很多进安徽山区外调，纷纷回来说“无中生有、人、事全无”。这个青年惯偷犯批斗了多次，后来听说“翻供”，坦白说“想编造检举材料立功。早点学习班毕业，分配去劳改农场。”

---

本期编辑：

华新民（美国）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思语（美国）

《CND》总编：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